

如何建構普世暨含攝文化理論

李仁豪*

摘要

針對「一種心智，多重心態；普世主義，考量分疏」的社會科學原則，黃光國提出兩步驟知識論策略因應：(1) 先提出一套普世理論模型；(2) 依此可套進任何一種文化內容或現象。其主要以「人情與面子理論模型」和「自我與自性的心理動力模型」為範例，說明該知識論策略。黃氏宣稱所提之理論屬先驗形式結構的普世模型，卻語焉不詳，而有窒礙難通之處。針對上述問題，本研究試圖從哲學進路和科學進路雙管齊下，闡述究竟何謂「先驗形式結構」，又何謂「普世性」，以及該如何建構一套兼具普世性暨含攝文化的理論。哲學進路包含新實在論、康德先驗哲學、結構主義，科學進路則包括演化論、知覺、認知和神經心理學。本文先以康德認識論解釋「先驗」，接著以皮亞傑結構主義詮釋「形式結構」。之後再從科學進路切入闡析「先驗形式結構」，藉由失認症和臉盲症，確認吾人認識外界(辨識物體)得先有先驗形式結構，爾後才能將外界事物的感覺質料，套入先驗形式結構，再聯結至習得的知識、記憶、名稱，產生意義。據此，再轉至方法學，說明兩種達到普世性的進路：先驗普世性和實徵普世性，稱作「雙重普世進路」。此是兩步驟知識論策略的修正版，希冀能做為本土社會科學建構普世暨含攝文化理論之準繩。

關鍵詞：先驗形式結構、含攝文化理論、康德認識論、普世模型、臉盲症、範疇之先驗演繹法

李仁豪* 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 (enigma4tears@gmail.com)

壹、緒論

一、普世法則之追求

本土心理學之創立，源自非西方國家心理學家對於當地科學社群缺少文化反思、盲目跟從西方心理學，感到極為不滿，欲建立一套屬於自身文化的心理學（楊國樞，1982；Kim & Berry, 1993）。然而，為了避免成為孤芳自賞、乏人問津的褊狹地域心理學，只關注文化殊相，未顧及人類共相，本土心理學乃至整個社會科學應當遵循「一種心智，多重心態；普世主義，考量分疏」(one mind, many mentalities; universality without uniformity) 原則建構理論、從事研究（Shweder et al., 1998）。其關鍵點亦即困難處，顯然在於「一種心智」，即「普世性」。

西方科學可遠溯至希臘哲學，但遲至文藝復興之後，經由培根（Francis Bacon）、笛卡兒（René Descartes）奠基的科學方法原則，以及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科普勒（Johannes Kepler）、伽利略（Galileo Galilei）、牛頓（Isaac Newton）等逐步建立的自然科學，促使科學革命，才逐漸從思辨哲學獨立出來，影響力倏地遍及全世界（Henry, 2008）。科學方法主要指演繹法和歸納法，前者憑藉數理邏輯推演，後者則依賴觀察、測量和實驗。自然科學樹立正統的科學典範，核心是透過科學方法找出事物的運作機制或因果關係，此乃具客觀性，不依人的主觀意志有任何改變。其自然法則當為普世性，屬全稱、普遍、必然命題¹。科學家孜孜不倦追求的便是此因果機制的「普世法則」（Holton, 1988）。之後的社會科學，如心理學、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大多以自然科學為典範，亦以追求普世法則為鵠的。

然而，社會科學研究的對象是人，人有自由意志、創造力、價值觀、符號溝通以及依這些所產生的文化，各文化能否共持有一套普世通則，乃至人文世界能否被化約至物理化學或生物法則，不無疑問。人兼具物性、生物性、社會性乃至靈性，若僅針對物性或生物性，不考量社會文化宗教因素，或許其運作機制為普世性的可能性很高，但若納入其因素，普世性通常就很難達成。正如李美枝（2011）表示，「一種心智」乃偏向神經、知覺、認知此端，而愈往社心人格、臨床諮商、工商組織、文化心理學彼端去，則「多重心態」愈發突顯。本土心理學更是處於「多重心態」此向度的極端點，揮舞著殊異、多元的文化旗幟，卻要追求「一種心智」，似乎背道而馳，乃至自相矛盾。

面對人同時處於自然世界和人文世界，以及心理學兼具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情況，該如何統合兩者，化解彼此間矛盾，是一大難題。追本溯源，「一種心智，多重心態」這個響亮震耳的社會科學原則，即根源於此。其問題意識為：在多元文化脈絡下，該如何

¹ 譬如牛頓物理學以物體、運動和力作為理論構念，形成一套唯物機械宇宙觀，此即為決定論。誠如數學家暨天文學家拉普拉斯（de Laplace, 1825/1994）所稱，只要確定某一事物的起始條件（如星體的位置、速度和向量），運用所知自然法則，便可推知預測該事物往後的所有行徑軌跡。

尋求普世性。在紀念楊國樞的論文集《Global Psychology from Indigenous Perspectives》，泰半圍繞在此議題（Sundararajan et al., 2020）。這亦是本研究最核心的問題意識：「兼具普世性和文化性如何可能？」及「如何建構普世暨含攝文化理論？」。

二、兩步驟知識論策略

本土心理學面對上述難題，大抵有兩條研究取徑。其一，採取跨文化研究、歸納法、資料導向、由下而上方式建構普世的人類心理學或全球心理學，譬如共有性客位研究法（derived etic approach）（Berry & Kim, 1993）、跨本土法（cross indigenous method）（Enriquez, 1979）、跨文化本土心理學（cross-cultural indigenous psychology）（楊國樞，1993; Yang, 2000）等，可統稱為「實徵普世性」（empirical universality）；這是大多數心理學家採取的主流進路。另一者則依後實證主義的立場，採取先驗論證、演繹法、理論導向、由上而下方式建構一套普世理論或形式理論，此可稱為「先驗普世性」（transcendental universality）；較少人採取此研究進路，黃光國是少數之一（黃光國，2011; Hwang, 2005）。他建構的「自我的曼陀羅模型」（the Mandala model of self）（Hwang, 2011）和「自性的心理動力模型」（a psychodynamic model of Self-nature）（Hwang, 2018），可合稱為「自我與自性的心理動力模型」，以及重新詮釋的「人情與面子理論模型」（Hwang, 2015b），當屬此類。

近年黃氏提出兩步驟知識論策略（Hwang, 2019）：（1）先建構一套「先驗形式結構」²普世模型；（2）依此套入各種文化型態或現象，並解釋之。譬如：他以「人情與面子理論模型」為範例，宣稱該模型為先驗形式結構且為普世性，接著以儒家文化作為具體範例，說明該模型亦能是含攝文化理論（黃光國，2018；Hwang, 2019）。在其論述裡，最核心、最關鍵，卻也是最解釋不清、最令人困惑的概念為「先驗形式結構」和「普世性」。黃氏將「先驗形式結構」翻作英文transcendental formal structure，學術上未有此詞彙，這是他自創。至於中文「先驗形式結構」，幾乎沒有學者使用，除了劉國英（1999，37頁）在〈康德與現代世界的哲學奠基〉有使用。其寫道：「康德的立說要顯示出，一切事物或客體之能成為人類認知活動的對象，都必先落入人類作為認知主體提供的先驗形式結構裡。客體所提供的，只是經驗事物（作為被認知的對象）的內容一面，這是因物而異的；但認知主體所提供的先驗形式結構，卻不是來自經驗的，因而具有絕對普遍性，既不會因人而異，也不會因物而異。」這段話將康德（Immanuel Kant）的先驗哲學表達得既精

² 黃光國稱作「先驗性的形式架構」或「先驗性形式架構」。其中「架構」一詞無法展示其概念蘊含的「結構主義」，且「先驗性」等同「先驗」，故本文稱為「先驗形式結構」。黃光國稱「架構」而不稱「結構」，似因他將「先驗性的形式架構」視為一種研究框架（research framework），但他卻以英文 structure 稱之，而不稱 framework，故陷入模擬兩可狀況。理論上，「先驗形式結構」可以是蘊含結構主義的「結構」，也能是隸屬研究框架的「架構」，故黃光國所稱「先驗性的形式架構」或「先驗性形式架構」亦能通。

粹又精準，唯劉氏將「先驗形式結構」用在康德哲學，黃氏則是擴大範圍，使用在他自己的理論模型。

將「先驗」、「形式」、「結構」這三個詞彙拼湊在一起，獨立另成一個詞彙和概念，這原是一項創舉，深具學術潛能。可惜黃氏未能解釋清楚，以致產生一些爭議及迷惑之處（李美枝，2011；葉光輝，2011；鄭伯壘，2011）。「先驗形式結構」和「普世性」是極重要的概念，不能只是泛泛之談，模糊帶過。倘若能將「先驗形式結構」論述清楚，將會對本文的問題意識「如何建構普世暨含攝文化理論」，提供一個深具啟發且明確的研究方向。

三、本文的研究取徑

本文探討的議題，本質為哲學問題。哲學為科學之母，科學的本體論、方法論和認識論，皆屬哲學範疇。然而，隨著自然科學取得巨大勝利，社會人文各領域紛紛仿效自然科學，也一一從思辨哲學獨立出來。到了廿世紀，哲學已經窄縮到如哲學家羅蒂（Rorty, 1967）所謂語言學轉向（linguistic turn），哲學工作與語言分析、符號溝通、澄清意義密不可分。狹義而言，指弗雷格（Friedrich Ludwig Gottlob Frege）以來的英美分析哲學傳統；廣義而言，亦能涵括歐陸哲學，如結構主義、詮釋學、存在主義、溝通行動論，乃至強調主觀建構、多元化、去中心化的後現代主義，其認定世界由語言構成，此為語言建構主義，德希達（Jacques Derrida, 1967/1997）為其代表。他的名言是：「文本之外一無所有」（引自岡本裕一郎，2016/2018）。由於後現代主義堅信實相乃主觀建構或世界由語言構成，那麼不同認識主體或不同語言建構的實相，自然就有所差異，因此衍生出相對主義，乃至虛無主義。至此，已走到一個極端。

物極必反，興衰交替。在迎接二十一世紀之際，後現代思潮開始消退，出現不同哲學轉向，主要有三個（岡本裕一郎，2016/2018）。（1）媒介學（mediology）轉向：指以溝通過程中的媒介和技術作為研究對象的一門學問。（2）自然主義轉向（亦稱認知科學轉向）：與其它哲學派別相較，它跟科學最貼近，試圖從科學角度詮釋或解決哲學問題，抑或以哲學詮釋深化科學。（3）新實在論轉向：這是對後現代思潮最強烈的反動，它明確以「獨立於主體、語言、思考之外的存在」為問題對象，試圖超越古典實在論的獨斷性格和後現代主義的虛無傾向，前者只探索沒有主體的世界，後者則只將主體的世界視為真實，新實在論認為各有所偏，因而欲重新建構一套新實在論。

本研究採取自然主義轉向和新實在論，前者是科學進路，後者是哲學進路，雙管齊下。在哲學進路，除了新實在論，亦以康德先驗哲學和結構主義為基礎，解析何謂「先驗」，又何謂「形式結構」。在科學進路，則是從演化、知覺、認知、神經心理學切入，藉由失認症和臉盲症，確認吾人認識外界（辨識物體）得先有「先驗形式結構」，爾後才

能將外界事物的感覺質料，套入先驗形式結構，再聯結至習得的知識、記憶、名稱等，產生意義。由此再轉至方法學，說明「雙重普世進路」之合情、合理、合法性，希冀此能做為本土社會科學建構普世暨含攝文化理論之準繩。

貳、何謂「先驗」？

一、康德面臨的困境

新實在論運動的核心人物蓋布瑞爾（Markus Gabriel, 2013/2015）認為後現代主義的癥結點在於其以建構主義為哲學基礎，而建構主義的源頭是康德。康德試圖突破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矛盾對立的藩籬，另起「先驗哲學」。康德之後，幾乎所有哲學家及流派無不得先瞭解康德哲學。此處談「先驗」，追本溯源，更得回到康德的先驗哲學。

西方哲學自希臘時代以來，始終圍繞一個本體論核心議題，即流變不居的現象界背後，是否有個感官無法觸及、不變永恆實在界（Russell, 1965）。一方強調事物皆處於流變，故主張流變（becoming）即是實相，如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另一方則認為感官世界虛幻不實，堅持現象界背後的存有（being）才是實相，如伊利亞學派（Eleatics school）的色諾芬尼（Xenophanes）、巴門尼德（Parmenides）、芝諾（Zeno），以及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到了柏拉圖（Plato），更將此說發展成一套完整的哲學體系，成為觀念論，提出天賦觀念、共相等重要概念，影響往後西方哲學和宗教甚鉅。尤其是中世紀教父哲學（Patristic philosophy）和經院哲學（Scholastic philosophy）將柏拉圖哲學結合神學，更是幾乎完全壟罩在這學說氛圍裡。流變說雖屈於劣勢，屬非主流，但仍有香火延續，此即唯名論（Nominalism），主張根本沒有共相這種東西，那些僅是符號名稱罷了。

文藝復興之後，由本體論稍轉向至認識論。培根創立以觀察、實驗為主的歸納法，成了經驗主義最堅實的依靠。稍後洛克（John Locke）明確主張根本沒有天賦觀念，知識主要來自感官經驗。再到柏克萊（George Berkeley），則走向極端經驗主義的唯我論，成了主觀唯心論。再到休謨（David Hume），則走向懷疑論，此懷疑並非針對經驗或感官，而是對知識和科學產生懷疑。科學主要探求普世法則和因果關係，休謨認為那是人類自身的聯想和習慣所致。他以太陽東昇為例，認為即便觀察這個現象千萬次，也無法保證明天太陽依然東昇。至此，知識或科學產生極大危機，該如何解決？這是康德面臨的第一個難題（Guyer, 2006a）。

認識論的另一個陣營是理性主義。儘管有不同立場和學說，但共同點大抵為極度強調理性能力，特別推崇形式邏輯演繹法（數學、幾何學），認為由理性推演出的知識，才是普遍、必然命題，才是科學所追求的目標。相對地，對於感性能力，理性主義傾向不信任，認為從感官獲得的知識不可靠，屬或然、偏稱命題。笛卡兒列舉許多錯覺的例子

來論證這一點，好比一根筷子放入水杯中，它會呈現斷裂的樣子等。柏拉圖甚至認為感官世界根本是幻相。笛卡兒、史賓諾沙（Baruch de Spinoza）、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沃爾夫（Christian Wolff）等理性主義者，無一不輕視感性能力，推崇理性能力。

由上述可知，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之矛盾對立甚烈，如同水火，該如何化解或融合？這是康德面臨的第二個難題（Baumgartner, 1985/1988）。

一般而言，英美哲學傾向經驗主義，歐陸則偏向理性主義，康德亦不例外，唯他對於理性主義者不加批判、天馬行空推想、論斷形而上之實相（如靈異現象、鬼神、上帝存在等），有些遲疑（Kant, 1766/1989）。直到閱讀休謨的著作《人類理智研究》（E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後，終於讓他從理性主義的獨斷論夢中徹底驚醒，從此便極力反對傳統形上學，並使他將研究焦點從客觀實在界轉向至主體認識論問題，欲探究人的認識能力和理性之界線或極限為何，認為若超越這一條線，皆屬空想、獨斷³。他扣緊「先天綜合判斷如何可能？」（How are synthetic a priori judgments possible?）此問題⁴，即如何保證知識是必然、普遍命題，同時又可增加新知識，而非套套邏輯（tautology；恆真語句）。若能解決這個問題，便能化解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間矛盾，並為科學（數學、幾何學、自然科學）提供知識論基礎（Kant, 1781/1996, 1781/2004）。

二、康德的解決之道：先驗範疇

康德提問「先天綜合判斷如何可能？」，亦即「如何確保科學知識既屬必然、普遍，又能提供新知識」，當是哲學史上一個創舉，最重要的哲學問題之一。對此問題，康德透過獨創的「範疇之先驗演繹法」（transcendental deduction of the categories），或「主體演繹」（subjective deduction），嘗試解決。最核心的概念為「先驗範疇」（transcendental categories）。先驗演繹法有兩個立論根基：（1）所有經驗必得透過主體所提供的先驗範疇才能形成，亦即先驗範疇是經驗形成的必要條件；（2）外在世界或物體必會符合或必得依循先驗範疇（Thomson, 2003）。第二點即所謂的「認識論的哥白尼革命」，因為其顛覆以往常識，即認為經驗僅單方面符合或依循外界世界或物體的模樣（Guyer, 2006b）⁵。

《純粹理性批判》出版後，學界普遍反應不佳，大多是不解、誤解所致。之所以如此，除了康德嘗試調和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兩邊皆不討好之外，原因大抵有兩個。

³ 主要聚焦在「知識和因果律能否只憑理性獲得」議題。

⁴ 康德認為數學、幾何學和自然科學皆屬「先天綜合命題」，《未來形上學之序論》有舉例說明（Kant, 1783/2008）。此見解（尤指數學、幾何學等形式科學為先天綜合命題）充滿爭議，許多學者並不認同（Shabel, 2006）。

⁵ 康德於 57 歲出版經典巨作《純粹理性批判》（1781），核心論述即為先驗演繹法，之後康德的一連串著作，如《實踐理性批判》（Kant, 1788/2015）、《判斷力批判》（Kant, 1790/2007）等，皆是奠基於此。換言之，康德是從認識論著手，進而擴及形上學、倫理學、美學、宗教哲學、政治哲學等各領域。

首先，《純粹理性批判》的文風艱澀，用詞混亂，或含糊，或歧義。例如a priori是極為重要、關鍵的詞彙，具有多種意涵，但康德在不同文句脈絡使用此詞時，卻不多做解釋是採何種界定（Kitcher, 2006）。其餘如concept、thought、intuition、category等，亦有類似情況，以致讀者無法理解或誤讀《純粹理性批判》。鑒於康德本身的缺失以及學界使用康德用詞之混亂，為了容易理解和方便討論，本文化繁為簡，僅以「先驗範疇」來代表、含括、統攝感性分析中的時間、空間直觀（intuition）（本文亦稱「時空範疇」）、知性分析的因果原理（principle of causality）（本文亦稱「因果範疇」）以及十二判斷範疇，不做細分。因其精神一致，皆蘊含「不依恃經驗」、「必然且普遍」和「純粹形式」，且皆是「主體自身所產生」，論據皆為「範疇之先驗演繹法」。本文進而以「先驗形式結構」取代或涵蓋「先驗範疇」，發展三種先驗形式結構（數、形、先驗範疇），稍後闡述。

第二個康德哲學難理解的原因是時代背景知識之局限。康德先驗哲學的根本論據在「範疇之先驗演繹法」，其核心概念為「先驗範疇」，此是劃時代之創舉，超越時代所能理解甚多。在康德的年代（1724-1804），學界普遍預設「經驗」是今生今世的個體發展史（ontogenesis）所產生，此屬「後天」（a posteriori），與「先天」（a priori）對反。「後天」容易瞭解，因處於經驗現象界，有形可觸，有色可見。相較之下，「先天」極難掌握。康德彼時人們普遍對基因、遺傳、演化幾乎一無所知，僅能空談「先天」、「本能」。即便到了1860年代，達爾文（Charles Darwin）創立演化論，孟德爾（Gregor Johann Mendel）發現遺傳定律，學界還是不甚瞭解，爭論依舊。直到1940年代，現代演化綜論（Modern Synthesis）將演化論、遺傳學、系統分類學、古生物學、細胞學等學科整合，才逐漸有定論。欲解析或深化「先天」的概念，抑或調和或化解「先天vs.後天」，必得從演化觀點切入。例如從演化論、遺傳學的視角，「經驗」亦可涵蓋種系演化史（phylogenesis）的「先祖經驗」（Delbrück, 1949），如此便化解「先天vs.後天」或「本能vs.經驗」的對立。至於「先驗」，內涵更加深邃難解，若非從演化論以及知覺、認知、神經心理學（科學進路）下手，無法得其三昧。本文後半部即是採科學進路，解釋「先驗形式結構」（涵蓋先驗範疇）。

總之，欲瞭解康德如何解決兩大難題「為科學知識奠定知識論暨形上學基礎」和「調和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得扣緊他獨創的先驗演繹法和先驗範疇，以及其首要任務：解決「先天綜合知識如何可能」⁶。康德主要援引「先驗範疇」處理此問題及其相關問題，這是關鍵一步，遂將真理、實相轉向主體。在感性分析中，康德認為時間和空間屬先驗

⁶ 「先天知識」指無須透過經驗即可獲得的知識，「後天知識」指透過經驗所獲得的知識。「綜合命題」指謂詞無法從主詞獲得，因此有增加新訊息之功能，例如：「紅蘋果甜」，此命題無法從「紅蘋果」推知「甜」。「分析命題」指謂詞的概念隱藏在主詞裡，僅分析主詞即能推導出謂詞，例如：「紅蘋果是紅色的」，僅分析主詞，便能推出謂詞。理性主義側重在先天知識和分析命題，經驗主義者偏重在後天知識和綜合命題。據此，「先天綜合知識」同時涵蓋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的主張。

範疇，那是人感知外界事物時主動賦予的形式框架，非事物本身所具有。所有事物必得先透過時空先驗範疇，才有可能被感知，吾人無法想像抽離掉時空性質的事物，因此它屬必然、普遍。另在知性分析，康德認為因果原理亦屬先驗範疇，任何因果律（law of causality）皆透過因果原理方得以成立。因果原理與因果律不同，前者是純粹形式、必然、普遍，後者得透過經驗，對特定具體事物做判斷。此外，康德亦提出形上學思辨範疇表（Table of Categories），有四種母範疇，其內各有三個子範疇：量（Quantity: Unity, Plurality, Totality）、質（Quality: Reality, Negation, Limitation）、關係（Relation: Inherence and Subsistence, Causality and Dependence, Community）、樣態（Modality: Possibility/Impossibility, Existence/Non-existence, Necessity/Contingency）⁷。這是吾人進行判斷、做形上學思辨、建立知識所賦予的形式框架（Kant, 1781/1996, 1783/2008）。

當然，亦可能有其它先驗範疇存在，這裡的重點在於：現象界所有具體事物，必得先透過主體賦予的範疇、框架或形式結構，才會形成知識。由於先驗範疇是必然、普遍，故能確保知識的必然、普遍性，同時又不至於與現實具體事物脫鉤，誠如康德的名言「沒有內容的思想是空洞的，沒有概念的直觀是盲目的」（thoughts without content are empty, intuitions without concepts are blind），形式（範疇）必得賦予內容（經驗）才有意義，而經驗內容（知識）會增長，非僅是分析命題的同義反覆。據此，康德運用先驗演繹法和先驗範疇，將「先天綜合知識如何可能？」解決了。同時，休謨留下的因果難題，也隨著康德將因果關係視為先驗範疇而一併解決。最後，先驗範疇形成吾人認識外界的框架，亦是限制，超出這界線便超出理論理性（theoretical reason）所能處理的範圍，此即區分現象界和本體界之緣由。人能認識的皆來自現象界，至於不可知的本體須交給實踐理性（practical reason）。這屬於康德倫理學，非本文關切之議題，故略過。

三、「先驗」之多義性

「先驗」的原文可有transcendental、a priori、apriority，前者偏向認識論意涵，後兩者偏向指涉命題。康德在書中使用「先驗」的頻率非常高，但涵義並非一貫（Kitcher, 2006）。康德使用「先驗」主要有三種涵義。

- （1）不依恃或非源自經驗。這是康德最常用涵義，也是學術界普遍的認知。
- （2）純粹形式。即指不具內容，非屬經驗現象之具體現實事物。此概念兼具認識論、邏輯和命題之涵義。
- （3）必然、普遍。當康德要說明某命題是必然且普遍時，有時會使用「先驗」一詞來表示。

⁷ 與此類似，康德針對邏輯思辨提出判斷表（Table of Judgment），亦有四個母範疇，其內亦各有三種判斷：量（Quantity: Universal, Particular, Singular）、質（Quality: Affirmative, Negative, Infinite）、關係（Relation: Categorical, Hypothetical, Disjunctive）、樣態（Modality: Problematic, Assertoric, Apodictic）。

參、何謂「形式結構」？

一、再論「先驗範疇」

依據上述，康德的「先驗」指「範疇」，不是「理念」或「觀念」，這是康德哲學普遍最被誤解之處。若是「先驗理念論」(Transcendental Idealism)，那便與柏拉圖的「天賦觀念論」幾乎無異，故應正名為「先驗範疇論」。先驗範疇論有以下幾個要點。

(1) 先驗範疇乃主體自身提供，非源自客體。如時空直觀、因果原理、十二範疇等。

(2) 先驗範疇乃純粹形式，不具內容。康德之所以取名為《純粹理性批判》，理由便在於此。康德的創舉在於將原來指涉客體的形式表徵，轉化為主體內在的形式表徵。

(3) 由於知識必得透過先驗範疇的形式框架，故為必然性。又人類感知結構裡的先驗範疇雷同，故為普世性。同時由於歸納法會落入休謨的懷疑論，無法達到必然、普遍知識之要求，因此，欲確保普世性，不能往外尋，只能轉向主體探求之 (Longuenesse, 2006; Walker, 2006)。

(4) 此普世性並非客觀實在論之意涵，而是互為主觀 (intersubjectivity) 的普世性。

由上述可知，新實在論者之所以認定後現代思潮的建構主義源自康德，其來有自 (Ferraris, 2015)。然而，必須澄清，康德並未否認現實界存在，相反地，他非常重視經驗。唯他所提的先驗範疇，使他偏向理性主義，遠離經驗主義。而他區分現象界和本體界，認為吾人理性只能觸及現象界，本體界乃不可知，這一點則使他傾向經驗主義，遠離理性主義。依此，實無法用傳統的理性主義或經驗主義定位康德，最貼切的定位就是「先驗主義」或「先驗範疇論」。

最後，何謂「範疇」？從康德的論述和學界用法來看，範疇是一種不具內容、徒有形式的結構，故可稱作「形式結構」。據此，「先驗範疇」可謂是「先驗形式結構」。然而，「形式結構」不僅可指稱主體的認識結構，亦能指涉客體的實存結構。前者屬認識論，後者屬本體論，其中哲學意涵截然不同，不可不察。

二、結構主義概說

廣義而言，凡是探究結構實相的學問，皆屬結構主義。狹義來說，是指廿世紀的結構主義。其偏向於關注客體之實存，即本體論層次，這算是實在論轉向，採客觀研究取向，探索社會人文科學的問題。結構主義濫觴於索緒爾 (Ferdinand de Saussure)、傑可布森 (Roman Jakobson)、克魯貝慈柯伊 (Nikolai Trubetzkoy) 等語言學家的研究 (高宣揚, 1992)。起初，索緒爾只提到「系統」(system)，未明言結構，但兩者概念實質接近，

故可互通，即「一系統內元素彼此間關係」，例如發音時子母音、清濁聲的對比關係。索緒爾亦提到一個重要概念，即共時性（synchrony）和貫時性（diachrony）之區分。前者指共存事物彼此間關係，排除時間的介入。後者指一事物的轉化流變歷程（de Saussure, 1913/1959）。此類似Archer和Elder-Vass（2012）的文化型態學（morphostasis）和文化衍生學（morphogenesis）之區分。據此，共時性結構即是結構型態學，貫時性結構即是結構衍生學。李維史托（Claude Lévi-Strauss）的人類學結構主義偏重前者，強調結構諸元素間關係的不變性（Leach, 1970）。皮亞傑（Jean Piaget, 1968/1970）的心理學結構主義則認為結構會動態發展，故偏重在後者。

三、結構之五要素

結構的特性或要素，皮亞傑認為主要有三項，分別是整體性（wholeness）、變形轉化（transformation）、自身調控（self-regulation）（Piaget, 1968/1970）。皮亞傑的結構主義主要著重在知識論，本文則擴及本體論層次，為使其更加周延，故添增動態均衡（dynamic equilibrium）和對稱性（symmetry）兩項。

（一）整體性

在一個結構中，每個元素都受其它元素的牽動。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一個元素都無法獨自發生變化。而當某種原因（如外力、突變等）促使一個元素產生變化，那麼也會牽動其它元素，乃至整個結構產生變化，此時該結構遂轉變為另一個結構（Leach, 1970）。因此，結構主義屬整體論（holism），反對化約論（reductionism）和原子論（atomism）。後兩者主張事物秩序或構成皆是由簡至繁，由部分可線性加成至整體，故可切割事物至最小單位，藉此推知整體性質。整體論則認為部分的總和不等於整體，欲瞭解一事物或一系統，得從整體全面以及元素之間彼此關係著手；事物意義乃在「關係」，而非元素自身（Piaget, 1968/1970）⁸。

（二）變形轉化

結構為一種形式，且會變形轉化。以拓樸學（topology）為例，好比一條橡皮筋經過拉扯、扭轉、纏繞，可以變成各種形狀，但其結構本質依舊不變。或以瓊斯基（Chomsky, 1957）的普世語法理論（Universal Grammar Theory）來說明，不變的深層結構可藉由語法轉換機制，變形轉化為各種表層結構。變形轉化有三個基本問題。首先，變形轉化的

⁸ 最早以整體論為哲學基礎的心理學派是完形心理學（Ash, 1998）。「完形」（gestalt）是德文，意指configuration、whole、form（Hergenhahn, 2009）。緣此，完形心理學與結構主義頗合拍。然而，皮亞傑認為完形心理學傾向將完形律視為不變，未深入探究發生學（genesis）歷程，故落入本質主義（essentialism）或柏拉圖理型的窠臼（Piaget, 1968/1970）。

機制為何？這屬近端原因（proximate causation），如語法轉換機制即是。其次，結構為何會或需要變形轉化？這屬終極原因（ultimate causation）。最後，一個結構變形轉化到何種程度才可視為不同結構？上述之答案須從以下三個結構要素來探求。

（三）自身調控

皮亞傑認為除了數學、幾何學和形式邏輯之外，自然界結構的形式和內容並非絕對，而是相對，亦即彼此是一種階層式關係（hierarchy or nesting）。哪種情況為形式或內容，端視從哪一層面切入以及與何者比較而定（Piaget, 1968/1970）。大致上，階層愈往上抽象（abstract），形式愈純粹（pure），內容愈稀薄。同理，某一結構可能成為更大結構，涵蓋其它子結構（substructure）或元素，亦可能成為更小結構或元素，處於母結構內⁹（Piaget, 1968/1970）。作為一個結構，無論處於何層級，皆不會喪失獨立性，原因是它有一套自身調控的機制。自身調控又有兩大特性：自行維持（self-maintenance）和封閉自足（closure）。正因為這兩特性，才會使結構無論如何變形轉化而能萬變不離其宗，始終維持同一性（Piaget, 1968/1970）。譬如語言的深層結構透過語法轉換機制，轉換成各種表層結構，但無論怎麼變化，深層結構依然不變。或以人體生理系統為例，體內有各種子系統，每個子系統皆有自己一套自律調節的機制¹⁰。自律調節通常透過回饋機制運作，反覆不斷，如環無端，可有反向回饋（negative feedback）和正向回饋（positive feedback）。前者通常可促使恆定（homeostasis），後者往往導致失衡。

（四）動態均衡

結構為形式，無法直接從現象界觀察到，其存在與否，只能藉由其功能、作用或效果推知；這是實效主義（pragmatism）的真理觀或存有論（William, 1907/2015）。有結構，必有功能，結構與功能乃體用關係。儘管各種結構有不同功能，但共同的終極功能是維持均衡或和諧（harmony）。以生理系統為例，即指恆定作用（homeostasis）。功能亦可稱作「目的」，只要未有擬人化意味即可。除了維持均衡外，結構存在或運作之目的，還有續存。以生命系統為例，指適應、生存和繁衍，生生不息。

結構儘管屬封閉系統，有一套自律調節、自行自足的運作機制，但它必得與結構外事物互動，無法獨立自存。互動可交換能量或訊息，目的是維持均衡和續存。依熱力學第二定律，一系統總是從秩序（order）趨向無序（disorder）或稱熵（entropy）（Atkins, 1994），這是時間之箭，成、住、壞、空，是所有事物必經路程。維持均衡亦可說是維持秩序，而維持秩序必得耗費能量，藉此產生力於那趨往無序的歷程，將之拉回秩序。秩序（無序）並非絕對，而是相對。然而，一系統從秩序到無序乃必然之事。當維持系統

⁹ 譬如在社會文化系統，族群（團體）可作為元素，但亦能自成一系統，個人則成為元素；以此類推。

¹⁰ 例如心臟系統透過延腦、頸動脈、心臟竇房結協同調節機制控制心跳，或內分泌系統透過大腦、腦下垂體、腺體的迴圈調節賀爾蒙濃度。

的自律調節機制失效，不再保有整體性而分崩離析時，該系統通常就通往無序，那便是死亡¹¹。

（五）對稱性

秩序結構往往對稱，無序結構則是失稱（asymmetry）。對稱指兩事物或一事物的兩部分，經過變形轉化或互換後仍維持不變。許多事物皆能發現對稱現象。對稱有空間平移、時間平移、滑移、旋轉、鏡像、反射以及方程式等多種呈現方式¹²（Feynman et al., 2006; Hargittai & Hargittai, 1994）。如同秩序為相對性，對稱亦復如是。另必須強調，對稱屬動態，完全對稱即是完全靜態，是死寂，乃為假象¹³，實際上不可能有完全對稱，如同現實界找不到完美的圓。

當結構失序、其機制失效時，亦隨之失稱，便無法再維持均衡，該結構即告死亡。華人文化的陰陽本體論，其太極圖即是一個對稱圖形。陰陽互動乃為了求得均衡和諧，達至陰平陽秘，如此便呈對稱。縱使有陰盛陽衰或陽盛陰衰，偏離對稱，結構仍可續存。然而，一但陰陽決離，便完全失去平衡，喪失對稱，那麼結構的生命就此結束。中醫經典《素問·生氣通天論》有言：「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陰陽離決，精氣乃絕」，即為此義。

肆、先驗形式結構為吾人認識外界之首要者

一、失認症

認識外界（辨識物體）的過程最關鍵的步驟為何？由病理現象可推知正常運作機制，而臨床研究發現，如果枕葉或顳葉某些部位損傷，可能導致視覺失認症（visual agnosia），即無法辨識物體，縱使病人的基本視覺能力皆正常（解析度、視野完整、能辨識線條、角度等）（Farah, 2004）。gnosia指認識或知識，agnosia即為缺乏認識能力或知識。失認症有兩種：一種為統覺失認症（apperceptive agnosia），此源自腦無法整合元件而形成「整體性」，較為前階；另一種為聯結失認症（associative agnosia），此類病患儘管保有對物體的整體性，也擁有該物體的知識，仍無法辨認物體，此導因於腦無法將物體的整體覺知感聯結至該物體的記憶或知識，此較後階。據此，辨識物體有前階「統覺辨識」和後階「聯結辨識」兩種歷程。

¹¹ 依熱力學第一定律「能量守恆」，維持原系統的能量尚在，只是轉化成另一種形式（結構）。

¹² 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發現的質能守恆方程（ $E=mc^2$ ），被視為是宇宙間最美的對稱（Lederman & Hill, 2004）。若專就形體而論，圓形最對稱，因為它無論怎麼旋轉，形體不變，故象徵完美、圓滿；四面體則旋轉 90 度不變，對稱性稍差。

¹³ 依熱力學第三定律，溫度不可能達到絕對零度。溫度指粒子運動，絕對零度即代表粒子完全靜止，但這不可能發生。既然結構內元素無時無刻在變動，就不可能完全對稱。

二、臉盲症

在眾多失認症中，臉孔失認症（prosopagnosia）（臉盲症）是較獨特的一種。所謂「獨特」（special）或「模組化」（modularity）指辨識臉孔是先天本能（innateness）、由特定腦區掌管（localization）、有別於其它物體辨識（specificity）。各種證據顯示，似乎是如此，唯仍有多變、難解的複雜層面（Bruce & Young, 2012; Fodor, 1983; Hole & Bourne, 2010）。如同失認症，臉盲症亦有兩種（de Renzi et al., 1991）。一種是統覺臉盲症（apperceptive prosopagnosia），此類病患無法將臉的部件（眼、眉、耳、鼻、口等）整合成一張臉，缺乏整體性，故無法辨識臉。另一種是聯結臉盲症（associative prosopagnosia），此類病患儘管對臉有整體覺知，且可以區分不同張臉，但無法知道這是誰的臉（如親人、朋友、名人等），甚至認不出自己的臉，但通常能藉由其它線索推知。依照Bruce與Young（1986）的模型，辨識臉有四個歷程：結構編碼（structural encoding）、臉部辨識（face recognition unit）、個人指認（person identity node）、提取人名（name generation）。統覺臉盲症是結構編碼失靈，聯結臉盲症則可統攝後三者，唯可再細分。倘若病人能辨識臉，其它一概不知，則是保有結構編碼，其餘三個歷程皆失靈（de Haan et al., 1987）。假使病人對某臉有熟悉感，但無法進一步確認是誰的臉，則是保有臉部辨識能力，但無法指認（de Haan et al., 1991）。如果能確認是誰的臉，卻無法提取人名，則是保有個人指認，人名提取損害（Flude et al., 1989）。

三、辨識物體之兩步驟原理

總括而言，統覺臉盲症的問題出在：初階關係處理（first-order relational processing；臉各部件間相對關係）失效，以及無法形成臉的抽象形式或整體性（Tanaka & Farah, 1993），簡言之，即是臉的「形式結構」。聯結臉盲症的問題則在：次階關係處理（second-order relational processing；臉各部件間空間距離）失效（Maurer et al., 2002），以及臉的形式結構無法與掌管知識、記憶、命名等區域相連結。由上述反推，正常辨認臉必得有兩步驟：（1）先有臉的形式結構；（2）將某張具體臉的視覺質料，先聯結至臉的形式結構，再聯結至知識、記憶、名稱。假使前者失效，將導致統覺臉盲症；假使後者失效，則促使聯結臉盲症。

其中「形式結構」為最前階、首要。研究發現部件之辨識在整體脈絡下，要比單獨辨識部件好，此稱整體優勢（Whole-over-part advantage）（Tanaka & Sengco, 1997）。儘管整體（形式結構）與部件為分開處理（Collishaw & Hole, 2002; McKone, 2004），但顯然整體更首要，倒立臉效應（The Face Inversion Effect）（Yin, 1969）、柴契爾錯覺（The

Thatcher Illusion) (Thompson, 1980)、合成臉效應 (The Composite Face Effect) (Young et al., 1987) 皆可佐證。此外，事件相關電位 (event-related potentials) 亦能確認結構編碼最早 (N170)，其次才是個人指認 (N250) 和提取人名 (N400) (Schweinberger & Burton, 2003)，這顯示臉的形式結構最先被處理。

人為社會動物，辨識臉在演化上極為重要，攸關生存繁衍，故當屬先天 (Pascali & Kelly, 2009)。研究發現剛出生才九分鐘的嬰兒即會偏好注視基模臉 (schematic faces) 甚於移位臉 (scrambled faces) (Goren et al., 1975; see also Johnson et al., 1991; Maurer & Young, 1983)。因此，臉的形式結構為「先驗」，即不依恃經驗、必然且普遍、純粹形式。必須釐清，臉的形式結構或統覺辨識，不同於原型臉 (prototype face)，此指將個別臉的各種樣貌給予平均化，好似嬰孩能辨識照顧者性別和與自己相同族群。這是在出生後三個月的事，乃需要經驗促發和修飾 (de Haan et al., 2001; Kelly et al., 2005; Quinn et al., 2002)。此處重點在於：臉的形式結構當是在種系演化史即保留下來，故一出生即保有「統覺辨識」能力；其餘則屬「聯結辨識」，是在個體發展史中透過經驗促發或修飾才得以發展出來。

總之，藉由失認症和臉盲症，可以確知辨識物體有兩大步驟：(1) 先有先驗形式結構，此乃與生俱來；(2) 將外界物體的感覺質料，先套入先驗形式結構，再聯結至習得的知識、記憶、名稱等，產生意義。先驗形式結構是虛，是空，為體，感覺質料內容是實，是有，為用，兩者缺一不可，否則無法產生意義。《繫辭·上》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器相即，體用不二，不可須臾分離，即是此意。唯必須澄清，形式結構不必然屬先天，亦可屬後天，視其演化上是否深具適應功能而定。通則是若有適應功能，則屬先天；若沒有，則屬後天。譬如腦不可能先天有鋼琴、手機等人工物的形式結構，此必是後天形成。唯其運作機制應源於自然物的形式結構，故原理相同。這用拱肩 (spandrel) 的演化概念，便能瞭解生物體有許多性狀或能力並非有適應價值而被天澤予以保留，而是其它更基本性狀或能力衍生出來的副產品 (Gould & Lewontin, 1979)。若像臉的形式結構，當屬先天，無可置喙。

伍、先驗形式結構乃源自種系演化史

前述就結構型態學闡析，可得知辨識物體必得透過先驗形式結構。若失效，將導致失認症，所剩者僅是一堆支離破碎、雜亂無章的感覺質料。此是先驗形式結構之所以必然、普遍的近端原因。以下將從演化角度切入，此屬結構衍生學，確認先驗形式結構實根源自種系演化史，乃透過每一代在其生態區位 (ecological niche) 的生存經驗，經由演化機制運作逐漸形成。此可提供先驗形式結構之所以必然、普遍的終極原因。

一、遺傳的知識多屬形式

一個演化學的問題是：個體今生獲得的性狀、記憶或知識，有可能遺傳至後代嗎？譬如某人認得達賴喇嘛的臉，那麼這個記憶會遺傳至後代嗎？抑或努力伸長脖子，使脖子變長，那麼後代能夠遺傳到被拉長的肌肉纖維嗎？若依拉馬克(Jean-Baptiste Lamarck)的用進廢退說(use and disuse)和後天性狀遺傳說(Inheritance of acquired traits)，答案是肯定的。若依達爾文演化論及現代綜合演化學說，答案是否定的。該說的演化機制是天擇、性擇、中性擇汰等，演化的單位是群體或基因庫(gene pool)，不是個體。天擇雖是作用在個體，但個體並不會演化，而由於群體有變異(透過基因突變、基因重組等而產生)，某些個體持有適應性狀(如較長脖子)，適者生存，便得以傳遞該基因至後代，而缺少該性狀的個體，便被淘汰，故無法傳遞該基因至後代。經由兼變傳衍(descend with modification)，該群體就逐漸演化成具有長脖子的特徵。必須強調，後天性狀遺傳說(用進廢退說)和天擇說，並非互斥，而是可並存的演化機制。

後天性狀遺傳說被棄置許久，但近年表觀遺傳學(epigenetics)某程度替拉馬克平反，不少證據顯示後天獲得的性狀確實有可能遺傳至後代，姑且不論那性狀為何或局限何在(Carey, 2012)。然而，所遺傳訊息不太可能是具體知識，除了少數之外，如感知系統預設光源來自上方或光源只有一處(Kleffner & Ramachandran, 1992)，其餘絕大部分當屬形式結構，理由是：人腦以及基因庫乃資源或空間有限，倘若將前生承襲的知識以及今世獲得的所有知識都傳遞下去，顯然不可能，肯定會資訊過載(overloaded)。職此之故，最具經濟效益的方法當是僅保留其形式、要素、結構、動作基模、感知基模、認知基模，或榮格的原型、集體潛意識等。

二、先驗形式結構為必然、普遍性

依瓊斯基的普世語法理論，語言乃先天本能，心理學家平克(Steven Pinker, 2000)提出相當多證據支持這一點。重點在於：該理論將語言區分為深層結構和表層結構，而遺傳下來的知識是深層結構，不是表層結構。前者是先驗的、形式的、唯一的、必然的、普世的，後者是後天的、具體的、多樣的、偶然的(contingency)、文化的。這必然如此，而非倒過來，否則將導致資訊過載，且僵化。語言系統只需要一個深層結構和幾個語法轉換機制，便能衍生出無限語言或語句。語言的深層結構實為說明先驗形式結構之所以為先天、必然、普世的一個極佳範例。

三、先驗形式結構為動態實存

無物不動，從物質觀、物種觀、宇宙論等各層面來看，皆是如此（李仁豪，2019）。依熱力學第三定律和粒子物理學，所有粒子（或弦）無時無刻皆在疾速振動。演化論則指出所有物種皆在演化中，沒有永恆不變的物種。天文物理學更證實整個宇宙處於加速膨脹中。或許由於其時空尺度非人類生命經驗所及，對於極小物質、極久的種化（speciation）歷程，以及看似無邊無際、無始無終的宇宙，會產生一種靜態錯覺。又或許是吾人探索流變不居現象背後的本體存有，總是預設其為永恆不變，但沒有理由為何本體不能是流變不居。

那麼先驗形式結構如何？從個體發展史（結構型態學）角度，有可能不變，但從種系演化史（結構衍生學）來看，不太可能永遠不變。先驗形式結構來自腦，而腦在演化中，先驗形式結構理應亦在演化中。演化腦意味著神經元彼此競爭、合作，遵循同樣的演化機制，適者生存，此為神經達爾文論（Neural Darwinism）（Edelman, 1987）。不僅種系演化史，個體發展史亦會發生神經元適者生存現象。尤其在生命初期，神經元非常多，然而隨著個體與環境互動，神經元卻不增反減，至少一半會死去，此為神經元凋亡（neuronal apoptosis），是種預定細胞死亡（programmed cell death）¹⁴。存活的神經元軸突、突觸會大量增加（Schmid & Wolfe, 2012），這似乎是種償換（trade-off），因資源有限之故。這種現象背後即是演化機制在作用，即依個體與環境互動狀況，決定該啟動哪些細胞的凋亡基因。

可以合理推想先驗形式結構亦有同樣機制運作，彼此競爭、合作、演化，無論是在種系演化史或個體發展史。以語言為例，過去幾十或幾百萬年，人類皆以口語溝通為主，因此其深層結構可能變化不大，然而在三、四千年前發明文字後，乃至到當今網路時代，滑鼠、手機等媒介出現，深層結構可能有所改變。證據顯示文明因素確實會改變基因，使表現型不同，以適應新形態環境（Pollard, 2009）。

儘管先驗形式結構歷經長年演化的擇汰，不太可能永恆不變，但最低階部件或元素形式（如線條、頻率、移動方向等）可能維持不變。唯這些並不構成整體，故非屬結構，結構的要素在於部件之間彼此的關係，而非部件本身。另外可能不變的是日月星辰、河川山澤、花草樹木或臉、四肢身體或照顧者（caregiver）（如母親、父親）等，但仍必須強調，被演化保留下來的當是先驗形式結構，不會具體呈現，感官質料主要會透過「數」、「形」或「範疇」的形式再表徵出來。

¹⁴ 凋亡與壞死（necrosis）不同，前者是一種為了適應生存環境而主動求死的死亡過程，屬正常發展，後者為病理現象。

陸、雙重普世進路

一、先驗普世性

欲找尋普世法則，可透過兩種途徑：先驗普世性和實徵普世性。茲先談前者。先驗普世性乃採演繹法或先驗論證。演繹法的基本模式為：設定某些命題為公設，配合運算法則，便能推導出定理。數學、幾何學和邏輯學等形式科學為演繹法典範。但它們也可運用在人文學科，如史賓諾沙的倫理學即是一例。然而，問題是其內容在系統內而言，皆屬套套邏輯，且無經驗內容，故不具檢驗性（*untestable*），僅具有有效性（*validity*）之判定。欲運用在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必考量經驗內容¹⁵。

至於「先驗論證」，除了康德所創的先驗演繹法外，批判實在論（*Critical Realism*）亦基於先驗實在論（*Transcendental Realism*）的立場，提出「追溯論證」（*retroductive argument*），意指：從一個已經發生的現象，推論到一個持久性結構，抑或從實際上的某一個事物，推論到更根本、更深處、奠定該事物之可能性的某一事物（*Bhaskar, 1975*）。本研究除了採取康德的先驗演繹法之外，部分亦採用批判實在論的追溯論證，即以神經科學、心理學、演化論為根基，將現時實存（表層結構）推向至亙古久遠的實存（深層結構），找尋「先驗形式結構之源始」。先驗論證與演繹法最大不同處在於：後者純屬方法學，前者則另涉及本體論，採實在論立場¹⁶。

先驗形式結構可有三種展現型態。

（一）數

此是最抽象卻又最精確的表徵，乃徒具形式、不具內容，然可放置各種符合數意涵的構念或具體項目聯繫至現象界，譬如「 $1+1=2$ 」屬形式表徵，「1人+1人=2人」則為具體表徵。依此，能同時滿足共相與殊相、形式與具體、虛與實、體與用、空與有，乃至「一種心智，多重心態」等看似矛盾對反但實為不可須臾分離的道器關係。一旦道器分離，即如康德所言，若非空洞，則為盲目。「數」不僅隸屬方法學，乃量化研究之基礎及憑據，更可被認為是事物實在自身或本源，如畢氏學派（*Pythagoras school*）主張「萬物皆數」。以「數」表徵或建構現象界或實在界，始終是自然科學的進路，並獲得巨大成功（*Stewart, 1997*）。另外，各種數具有不同實質和象徵意義，在各文化，極為類似（*Lundy,*

¹⁵ 例如邏輯經驗論者韓佩爾（*Hempel, 1965*）的覆蓋律模型，先設定說明項（*explanans*），包含普遍定律和先行條件，此必得有經驗內容，再運用邏輯推論，便能推導出待說明項（*explanandum*），即事象描述。抑或他稍前所提的公理演算系統，藉由界定原始術語，並設定初始假設，便可推演出其它理論命題，再運用對應規則，對上述理論命題作經驗的解釋，使成為蘊含經驗術語的命題（*Hempel, 1958*）。

¹⁶ 韓佩爾晚期即轉向至實在論，提出一個公式來表示理論的構成： $T = \langle I, B \rangle$ 。I 指內在原理，說明理論假定的實體和過程，以及支配這些實體和過程的定律。B 指連接原理，解釋內在原理與經驗現象間關係（*Hempel, 1977*）。

2005)，故可能為人類集體潛意識的原型。

（二）形

此指抽象的形，非具象的形。數能計算，形則不能，然形和數可互為轉換，此為幾何學。形在自然現象和科學理論裡占有非常重要之地位（Hildebrandt & Tromba, 1985），且各種形狀或多面體各自有其象徵和實質意義（Lundy, 2002），在各文化，亦極類似，例如內圓外方的曼陀羅圖形（Hwang, 2011），可能是人類集體潛意識的原型。黃光國的「自我與自性的心理動力模型」採內圓外方、四面體和八面體，即是以「形」作為先驗形式結構（Hwang, 2011, 2018），故可放置任何符合圓、方、四面體、八面體之象徵意義的構念或具體項目。譬如「圓」可象徵慈悲、神聖、天堂、心靈、綜合的盡理之精神；「方」可象徵智慧、世俗、人間、物質、分解的盡理之精神，四面體可象徵四季、四個方位、四大元素、四聖諦，八面體可象徵八個方位、八卦、八正道等。

（三）先驗範疇

此源自康德認識論，依十二判斷表，再加上數和形（數學、幾何學），便可做數理邏輯運算推演；或依十二範疇表，則可進行形上學思辨。此外，亦有統籌或規範事物的先驗範疇，可為思維或知識之框架，稱作「事物先驗範疇」。此乃儲存於種系演化史的心理基模，屬「物種集體潛意識」，大多無須經驗即可獲得，因其超脫文化，故為普世性。例如動物會將事物歸類為「食物vs.非食物」、「危險vs.安全」、「我群vs.他群」、「同性vs.異性」、「性訊號vs.非性訊號」等（Lakoff, 1987）。另有非屬先驗範疇的「含攝文化範疇」（culture-inclusive categories），此儲存在個體發展史的心理基模，屬「文化集體潛意識」，指個體從出生後即沉浸於某文化內而獲得的事物範疇，往往被視為理所當然。但由於文化受制於經驗和時空脈絡，故不必然為普世性。例如儒家的「五倫」、「五常」，諸如此類。「事物先驗範疇」的內容有時會與「含攝文化範疇」重疊。

除此之外，是否有先驗知識？依本文對「先驗」的界定為不依恃經驗、必然且普遍、純粹形式，然「知識」屬命題，有具體內容，可做真假檢驗，非純粹形式，故不屬先驗。據此，唯有先天知識（innate knowledge），不會有先驗知識，因「先驗」和「知識」內涵矛盾。記憶神經生理學家Yadin Dudai（1989, 2002）認為先天知識攸關生存繁衍的本能行為，如反射和預定行為型態（programmed behavioral pattern），像是飲食、交配、打鬥和逃難（feeding, mating, fighting and fleeing）。有些先天知識不受經驗影響，有些會被經驗所調節，有些則需要經驗涉入引發才會展現。通常基因會設定在某一段敏感期（sensitive period），假使在該時期，未有經驗涉入引發，將不會展現，如銘印作用（imprinting）或鳥鳴（birdsong）。另一種是預定設限（prepared constrained）的連結學習，每個物種的連結學習傾向和型態不盡相同，通常與各自依存的生態活動和求生伎倆

有關。除了動作基模和認知基模的先天知識外，感知系統亦存有許多先天知識，預設事物的本質為何。這從許多錯覺現象可得知。例如感知系統會預設「光源來自上方」或「光源只有一處」（Kleffner & Ramachandran, 1992; Ramachandran, 1995）。或視覺心理學家 Richard Gregory（1970）透過面具發現的凹臉錯覺（Hollow-Face illusion），顯示感知系統會預設「人臉是凸的」。或當吾人坐在火車，透過景窗觀看隔壁火車移動而產生的自身運動錯覺（Illusion of self-motion），這顯示感知系統會預設背景景觀是靜止，也因此當隔壁火車（被預設為背景）駛動時，感知系統由於預設背景不動，故會將之解讀為是自身火車駛動。其原理與夜空中的月亮彷彿在雲中穿梭的誘發運動（induced motion）一樣。飄動的是雲，但感知系統預設雲是背景，不會移動，故解讀為月亮（主體）在移動。

先天知識儲存在種系演化史的心理基模，不學而知，不習而能，故具普世性。這與「含攝文化知識」不同，其儲存在個體發展史的心理基模，往往被視為不證自明，但由於文化受制於經驗和時空脈絡，故不必然為普世性。唯可透過實徵普世性的途徑，檢驗真偽，建立普世性。佛教預設「凡人皆為自私、我執，有貪、嗔、癡，但亦有同理心、慈悲心、大愛精神」，即是一例（李仁豪，2019）。先天知識可做為知識系統的公設、初始假設、形上預設、普遍定律或硬核。至於先驗形式結構的數、形和先驗範疇，屬前設（preassumption），不具檢驗性，可受檢驗者是套進其形式架構的具體內容。

先驗形式結構（數、形、範疇）和先天知識雖然常被視為理所當然，不易否證，但當階層結構不同，尤其是尺度極大或極小時，浮現特性（emergent property）可能產生極大變化（Anderson, 1972），有些不證自明的形上預設可能會被推翻，或被發現其適用範圍有局限。譬如牛頓以先驗絕對時空範疇為形上預設，依此建構出物體運動法則，然而愛因斯坦卻以非歐氏幾何學為先驗空間基礎，建構出廣義相對論，蘊含相對時空觀，推翻了絕對時空觀（Kaku, 2004）。又古典物理學預設的線性、機械性、決定性之因果原理，長久深入人心，卻被量子論推翻（Herbert, 1985）。或各種文化、法律、道德規範普遍預設的「人有自由意志」，長期被視為理所當然，亦被嚴重質疑（Hood, 2012; Wegner, 2002）。心理學界直接探索人類認知系統的先驗範疇和先天知識最著名者，非皮亞傑莫屬。其以康德認識論和結構主義做為哲學基礎，進行一系列發展實徵研究，修正不少既定認知先驗範疇和先天知識（Piaget, 1972/1981）。

二、實徵普世性

實徵普世性方法主要是歸納法。依後實證主義，尤指波柏（Karl Popper, 1934/1959）的否證論，主張吾人實無法窮盡所有事例（過去、現在、未來、世上各角落），因而歸納法在邏輯上和事實上皆不可能達到普世性（黃光國，2011）。波柏如同大多數哲學家和科學家皆以自然科學為典範，故以全稱命題為追求目標。這個預設立場讓反歸納法的否證

論陷入許多難題。例如有所謂「Duhem-Quine論題」，或拉卡托斯（Imre Lakatos）的「精緻否證論」，或費耶本德（Paul Feyerabend）的「韌性原則」等，紛紛對否證論提出質疑。其中比較有力的論點是：即便命題被某些反例否證，但可以提出輔助假設、先行條件、保護帶、參數或常數，或歸因於實驗或觀察條件等，來修正理論或保護硬核，如此理論便可屹立不搖或符合科學家的信念¹⁷。

至於其它論點皆未命中要害，例如許多成功的科學理論，像是量子論是屬概率式理論，以及社會科學亦幾乎皆屬概率（偏稱）命題，而在邏輯上，再多的觀察事件也無法否證概率命題，所以否證論失效。這裡有一個疑問：假使全稱命題能被否證，為何概率命題就不能被否證？誠然在全稱命題，反例指單一事例，好比抓一隻黑天鵝便能否證「天鵝皆白」命題，然而在概率命題，並非單一反例就能否證。設想有一命題「戴口罩的人有一成會呼吸困難」，研究卻發現「有兩成」，這難道不是否證？然而，最關鍵處仍在於：當概率命題被否證時，科學家亦可提出輔助假設或參數，抑或調整先行條件或保護帶，來修正或維護理論。如此其理論及其命題或法則仍舊可以成立。

依據上述，歸納法並非如後實證主義者（否證論）聲稱，無法建立普世知識。藉由歸納法建立的實徵普世性，最核心概念大抵有二：（1）從樣本推論至母體的正當性、有效性或代表性；（2）誤差。統計學已有許多充分的解釋說明，論證其乃合理、合法（Skyrms, 2000）。本文僅從感知歷程切入，佐證歸納法（推論統計）的合情（符合人性）。

面對外界訊息，感知系統並非照單全收，而是有一套隔離、過濾和注意力取捨（selective attention）等機制。其是基於能量有限以及動作局限，即生物體於某一時間只能往某一方向做出一個動作，而感知是為了行動，是以接收訊息不用多，只需適洽，以符合「耗費最少能量，發揮最大功效」的系統運作原則（葉素玲、李仁豪，2005）。以視覺為例，人眼有視錐和視桿兩種受器，前者空間解析度高，偏重在形和色，集中在中央小窩，僅兩度視角左右，後者時間解析度高，偏重在動，分散在中央小窩之外。注意力總是追隨在中央小窩，因為此處最清晰可辨。問題是為何僅兩度視角，吾人覺知的世界卻是全景式？加上眼球不斷移動或跳動（saccade），一秒僅有三、四次駐留，故景象當是動態，且會糊掉不清，但呈現出的卻非如此，這是為何？又所見物體常是模擬兩可（ambiguous）、不完整（incomplete）、被遮蔽（occluding and shading）、裂解的（fractal），吾人卻能輕易辨識出該物體，譬如種種，又是為何？

¹⁷ 現舉一例。愛因斯坦在創立相對論之後，有一些物理學家不約而同從其理論推導出「宇宙處於膨脹」，然而這有違西方文化和宗教的普遍信念「宇宙是靜止的」，愛因斯坦亦是持靜態宇宙觀。於是在相關方程式添加一個「宇宙常數」（cosmological constant），如此推導出來的宇宙便能呈現靜止狀態。未料沒過多久，天文物理學家哈伯（Edwin Hubble）觀察到所有星體皆呈現都卜勒效應（Doppler effect）的紅位移現象，這意味眾星體乃遠離我們而去（若遠離，光波和聲波會拉長，頻率降低，故呈現紅位移；反之，若趨近，光波和聲波會壓縮，頻率提高），易言之，宇宙確實是處於膨脹中。愛因斯坦深感悔恨，稱其「宇宙常數」為他一生所犯的最大錯誤（Biggest Blunder）（Kaku, 2004）。未料在上世紀末發現暗能量（dark energy），顯示宇宙不僅是膨脹，且是加速膨脹，而其方程式正需要「宇宙常數」，也因此「宇宙常數」又復活了，此是後話。

根本上，視覺僅是取樣（sampling）一小部分，藉由腦內在機制無意識推論（unconscious inference）其餘模糊、雜訊或空白部分，造成一種全景式錯覺（Gregory, 1980）。正如視網膜有個盲點（blind spot），此處是視神經纖維通過之處，缺乏視覺受器，但視覺景象卻正常無損，此即腦主動建構或填補（filling-in）所致（Breitmeyer, 2010）。這種由部分推至全體的推論方式，即屬歸納法（Palmer, 1999）。而其最終獲得的覺知物（percept），往往最簡潔、最佳、最適（optimal）、最有可能發生（most probable）或最合理（most plausible），儘管偶爾會出錯，如同統計誤差值。進一步探究，感知系統似乎遵循機率論貝氏定理（Bayes' theorem）（Kersten et al., 2004）。其特色是納入主觀機率，原理是不但考量當下最新資訊，亦參考事前機率（prior probability），即過去該事件發生的機率，所得者即事後機率（posterior probability），而這事後機率會再納入事前機率內，成為下次該事件的事前機率成分，如此反覆，不斷更新。據此，事前機率始終在變。就感知系統而言，尚可加入主體的期望值。但有一個疑問：事前機率如何導出？皆來自學習經驗？抑或遺傳先天？或許都有（Gregory, 2009）。經驗主義強調今生經驗，屬個體發展史；理性主義強調先天本能，屬種系演化史，亦即來自物種的集體經驗；這兩者理應共構事前機率。

低階感知系統與高階認知系統，其原理應類似。既然感知系統能夠「見微知著」，認知系統應該也能。因此，擅於將偏稱命題（樣本）推論至全稱命題（母體）的歸納法，甚為合理且合法，遂能達至實徵普世性。唯其本質仍屬概率性，亦有誤差在，這與先驗普世性不盡相同。

實徵普世性達成途徑有三種。

（一）跨文化研究（cross-culture study）

假使經由跨文化多重比較後發現，各文化人群有一致心理與行為，那麼就有普世性可能。

（二）發展研究（developmental study）

第一點無法排除強勢文化（如西方文化）加諸其它文化之影響，這屬後天環境因素，是弱勢文化人群被轉化後的心態表現。藉由發展研究，較能分離遺傳因素和環境因素。假使各地人群的發展次序、展現都類似（特別是發展初期），那麼就有普世性可能。

（三）貫時性研究（longitudinal study）

假使人群的某心理與行為並未隨著時代變遷而改變，那麼亦有普世性可能。

除了上述三種，另有比較心理學（comparative psychology）取徑。由此不僅可建立實徵普世性，亦可連結先驗普世性。從演化角度，找尋人類普世心智不能單就人類本身

看，應當拿人類近親靈長類大猿（如黑猩猩、巴布諾猿、大猩猩、紅毛猩猩等）來對照；對比可突顯差異，有差異即有存在。譬如研究顯示辨識臉不僅是人類獨特能力（先天、特化腦區、有別於其它物體辨識），許多動物（尤指靈長類）亦如此（Pascalis & Kelly, 2009），這顯示辨識臉是來自種系演化史，故為普世性。

三、先驗普世性優先原則

一般方法論較少以認識論為基礎或涉及知覺歷程。方法論關切如何建構具效度信度的知識；認識論探究人如何認識世界；知覺心理學用科學方法檢驗認識論的各種主張；這三者理應相契相合。本研究從失認症（以臉盲症為例）切入，推知人類認識外界（辨識物體）有兩大步驟：（1）統覺辨識；（2）聯結辨識。儘管黃光國提的兩步驟知識論策略與此知覺歷程相仿，但有幾點關鍵差異。

首先，黃氏兩步驟知識論策略有強烈反歸納法傾向（Hwang, 2019），這確實也是黃氏一路走來、始終如一的一貫立場（黃光國，2011）。然而雙重普世進路並不反歸納法，而是演繹法和歸納法並重。其次，兩步驟知識論策略對於第一步驟建構的先驗形式結構，語焉不詳，未深究其內涵。雙重普世進路則從康德先驗哲學、皮亞傑結構主義以及演化、知覺、認知、神經心理學等切入，賦予認識論基礎乃至本體論意涵。最後，兩步驟知識論策略未能闡明為何兩步驟策略可以成立，故不具信服力。雙重普世進路以人類認識事物的基本歷程做為基石，賦予其堅實的心理學基礎，並進而對第一步驟和第二步驟各自提出三種途徑，以期能達成先驗普世性和實徵普世性。儘管兩步驟知識論策略和雙重普世進路有這些差異，但仍有共通點，即兩者皆主張必須先建構一套蘊含先驗形式結構的普世理論。然而，該如何進行？

必須先強調，先驗形式結構雖屬形式，不具內容，卻是根源自種系演化史，來自物種長期演化擇汰的「經驗」。同樣原理轉至方法論，雙重普世進路第一步驟設定的先驗形式結構（主要指「先驗範疇」），亦能來自「經驗」。換言之，可藉由內容分析、文獻回顧、後設分析或因素分析得來的結果，暫時充作（tentative）「先驗範疇」。第二步驟便可套進符合其要素的含攝文化現象或內容，進行檢驗。抑或再套進其它文化內容，考其異同，進一步尋求實徵普世性。亦可在第一步驟額外添加先天知識，做為公設、初始假設、普遍定律或硬核，第二步驟再添加含攝文化範疇或知識，做為輔助假設、先行條件或保護帶。至於以「數」和「形」做為先驗形式結構，此為更純粹形式，並非奠基在歸納法、後設分析或因素分析。但如同先驗範疇，「數」和「形」亦能套進符合其要素的具體事項。依照上述步驟，便能建構一套普世暨含攝文化理論。

一個通則是：雙重普世進路第一步驟所設定的先驗形式結構，不具檢證性，可受檢驗者是第二步驟依先驗形式結構套入的具體內容。譬如：以「數」做為先驗形式結構，

要驗證的不是「數」本身，而是具體事項。假使發現檢驗結果不符合該數學系統推演的結果，那麼有兩種可能。一者觀察條件或實驗歷程或援引理論有錯。二者使用錯誤數學系統，應該嘗試其它數學系統。數學系統何其多，有些能對應現象界，有些則不確定。依據批判實在論的深度本體論（depth ontology），實相是層疊化實相（stratified reality），每一層級可能會產生浮現特質（Bhaskar, 1975），而背後「數」和「形」之先驗形式結構可能也隨之改變。譬如在日常尺度歐氏幾何學與現象大抵相符，但時空尺度極大時，就不適用，這是相對論使用非歐式幾何學的原因。抑或時空尺度極小時，如進入普朗克尺度（空間尺度 10^{-33}mm ；時間尺度 10^{-43}sec ），那可能是十維或十一維時空，亦得援引更高深複雜的數學系統描述量子世界（Greene, 2003）。抑或進入一個非線性的複雜系統，若想描述或解釋其內諸般現象，則必須創造全新數學不可（Goodwin, 2001; Stewart, 1998）。「先驗範疇」同理可推，不贅述。

最後，第一步驟不僅具有本體論意涵，亦可視為一種方法論策略。勞登（Laudan, 1981）認為科學哲學可分為兩大部門：科學的概念基礎，如物理學哲學、生物學哲學等，以及科學方法論理論，這可分為證實法（validation）和啟發法（heuristics）兩大類。絕大多數研究屬證實法，側重在支配理論的檢驗原則。至於啟發法，則是偏重如何擴大理論適用範圍，抑或何種經驗方法有助於發現新理論，此乃實效主義。第一步驟可視為一種啟發法，屬於引導研究、啟發靈感的通則研究框架（general research framework），而不屬於證實法，第二步驟才是。

柒、總結

本研究的基本立場有三。其一，調和或超越學界常見的二元對立（尤指本土心理學界），一方持經驗主義（重後天因素、歸納法、實徵研究），一方重理性主義（重先天因素、演繹法、理論建構），故以康德先驗哲學為出發點，推演發揮。其二，跳脫臺灣心理學界普遍畫地自限的泥淖，故嘗試運用跨領域的知識和研究成果，如哲學、演化論、知覺、認知、神經心理學等，藉以論證本文的核心論點。其三，導正以往討論方法論卻少談認識論，以及談認識論卻未引用知覺暨認知心理學之弊病。

至於本研究的問題意識為「如何建構一套兼具普世性暨含攝文化的理論」。普世理論是科學追求的目標，本土心理學亦不例外。然而，本土心理學同時亦背負著建構含攝文化理論的重責大任，該如何建構普世的含攝文化理論，這是最重要亦是最難解的方法學問題。黃光國提出兩步驟知識論策略，提供一個新取徑，關鍵在第一步驟，建構普世的先驗形式結構，可惜黃氏未能闡明清楚何謂「先驗形式結構」，又何謂「普世性」，又「建構理論的兩步驟策略」何以能夠成立。本研究抽絲剝繭，直探問題核心，試圖解決上述難題。

本文貢獻有二。首先，深入剖析「先驗形式結構」，為本研究奠定基礎。接著，以此為基礎，提出「雙重普世進路」。主要從失認症（以臉盲症為例）切入，得知人類認識事物有兩個關鍵步驟。（1）統覺辨識：先有先驗形式結構；（2）聯結辨識：將外界事物的感覺質料，先套入先驗形式結構，再聯結至習得的知識、記憶、名稱等，產生意義。由此轉至方法論，第一步驟即「先驗普世性」，能以數、形、先驗範疇做為先驗形式結構，抑或做為通則研究框架。第二步驟則透過文化具體內涵連結先驗形式結構，進而建立「實徵普世性」，可藉由跨文化研究、發展研究、貫時性研究等途徑來達成。

必須強調，雙重普世進路源自康德先驗哲學，其目的在調和理性主義與經驗主義間的矛盾對立，並企圖為科學建立穩固的知識論基礎。緣此，雙重普世進路雖同時採納演繹法尋求先驗普世性以及歸納法達到實徵普世性，但並不將兩者截然二分，或視為對立矛盾，實不反歸納法，更不反演繹法。相反的，演繹法（先驗普世性）和歸納法（實徵普世性）交織互融。譬如欲以先驗範疇作為第一步驟的先驗形式結構，必須藉由歸納法或經驗分析的方法。另歸納法極度仰賴統計學，而統計學乃數學之一支，所以歸納法實依靠作為「數」的先驗形式結構才能達成實徵普世性。總之，切勿以二元對立的思維看待雙重普世進路。

未來研究可有幾個方向。

（1）依循雙重普世進路，建構一套普世暨含攝文化理論。

（2）以本文闡明的先驗形式結構，重新詮釋或擴展現有心理學模型或理論，例如榮格的深層心理學，或「自我與自性的心理動力模型」，尤其指集體潛意識、原型、自性（The Self or Self-nature）等概念，與本研究最相關，期望能與之交互詮釋辯證，深化或修正彼此論述。

（3）以先驗形式結構重新詮釋傳統哲學思想。譬如被視為大道之源、諸經之祖的《易經》所持的陰陽論，是華人文化的核心要素和本體論基礎。陰陽有名無實，《繫辭上》云：「一陰一陽之謂道」，又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可知陰陽是不折不扣的形上學概念，其本質即為先驗形式結構，深具「空」之妙用，可統攝、容納萬物，被視為是萬物之本源。《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云：「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又《素問·陰陽離合論》曰：「陰陽者，數之可十，推之可百，數之可千，推之可萬；萬之大，不可勝數，然其要一也。」即表示萬物源自並統攝於陰陽。陰陽更具備先驗形式結構的三種展現形式（數、形、範疇）。在「數」，即二進位（0、1）算則，或河圖洛書的黑白子演算。在「形」或「象」，如太極圖或《易經》各種卦爻的取象比類。在「範疇」，指以陰陽來統攝事物。李維史托（Lévi-Strauss, 1976）勘查各文化的思維模式，發現普遍有二元分類現象，這顯示陰陽不僅屬含攝文化概念，更有普世性之潛能，絕非如程石泉（1981）所言是根源性譬喻（root metaphor），或黃光國（2018）所講是生活世界中所玩的一種語言遊戲，如此是嚴重誤解並窄化陰陽

論。

(4) 藉由先驗形式結構和雙重普世進路來解決「黃光國難題」。陳復(2016, 2018)首提黃光國難題,引起學術界不少討論,已有具體成果呈現(陳復、黃光國,2019)。黃光國難題根源於中西會通之議題,可反映在本體論、方法論和知識論三層面,最關鍵者為本體論(李仁豪,2020)。核心要點為西方文化持「主客對立」,蘊含主客分離、事物獨立自存、化約論、靜態觀,和講求掌控之道的人為主義之形上預設,東方文化則持「天人合一」,蘊含主客合一、萬物相依互存、整體論、動態觀,和自然主義之形上預設,兩者如何可能融通?倘若真能融通,必隱含兩文化可共持「一種心智」,然那是甚麼?是「先驗形式結構」嗎?又如何從「一種心智」展現或演進至東、西文化這「兩種心態」?以中國哲學術語來說,黃光國難題其實亦是關於「一心開兩門」、「兩行之理」、「理一分疏」問題。探其究竟,「心真如門vs.心生滅門」、「存在之理vs.形構之理」、「道vs.器」、「體vs.用」等中國哲學重要問題,與康德的「先天綜合判斷」以及西方哲學諸多重要議題,如「共相vs.殊相」、「存有說vs.流變說」、「實在論vs.唯名論」、「理性主義vs.經驗主義」、「演繹法vs.歸納法」等,本質並無殊異。本文提的「先驗形式結構」和「雙重普世進路」,當可融通上述看似二元對立的諸種論說。

最後,「先驗形式結構」和「雙重普世進路」是創新概念,必有所不周之處,希冀未來能藉由與學界對話,不斷修正、深化,如波柏提的進化知識論(evolutionary epistemology),以達盡善盡美,並進而形成新的研究典範,以裨益本土社會科學。

參考文獻

- Baumgartner, H. M. (1988)。康德純粹理性批判導讀(李明輝譯)。聯經出版社。(原著出版年:1985)
- Kant, I. (1989)。通靈者之夢(李明輝譯)。聯經出版社。(原著出版年:1766)
- Kant, I. (2004)。純粹理性批判(鄧曉芒譯)。聯經出版社。(原著出版年:1781)
- Kant, I. (2008)。一切能作為學問而出現的未來形上學之序論(李明輝譯)。聯經出版社。(原著出版年:1783)
- 李仁豪(2019)。佛家依存主義。本土心理學研究, 52, 115-172。
- 李仁豪(2020)。雙重尋道論:「主客對立」與「天人合一」之對立與合一。本土心理學研究, 54, 177-237
- 李美枝(2011)。評論黃光國的「含攝文化的心理學」:好像不是心理學?本土心理學研究, 36, 111-125。
- 岡本裕一郎(2018)。當代最新哲學應用(葉小燕譯)。時報出版社。(原著出版年:2016)
- 高宣揚(1992)。結構主義。遠流出版社。
- 陳復(2016)。黃光國難題:如何替中華文化解開戈迪安繩結。本土心理學研究, 46, 73-

- 陳復 (2018)。儒家心理學：黃光國難題正面臨的迷陣與突破。 *本土心理學研究*，49，3-36。
- 陳復、黃光國 (主編) (2019)。 *破解黃光國難題的知識論策略*。心理出版社。
- 程石泉 (1981)：中國哲學起源與神話。載於 *哲學、文化與時代*。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 黃光國 (2011)。 *心理學的科學革命方案*。心理出版社。
- 黃光國 (2018)。 *內聖與外王：儒家的完成與開展*。心理出版社。
- 黃光國 (2019)。傳承儒家的科學進路。 *哲學與文化*，46 (10)，5-28。
- 楊國樞 (1982)。心理學研究的中國化：層次與方向。載於楊國樞、文崇一 (主編)， *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的中國化*。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楊國樞 (1993)。我們為什麼要建立中國人的本土心理學。 *本土心理學研究*，1，6-88。
- 葉光輝 (2011)。談如何建構一個好的本土心理學理論。 *本土心理學研究*，36，139-153。
- 葉素玲、李仁豪 (2005)。一心一意或三心二意？視覺注意力的統整性。 *應用心理研究*，25，143-178。
- 劉國英 (1999)。康德與現代世界的哲學奠基。載於 *永久和平的倡議者——康德作品選讀* (劉國英選讀)。誠品出版。
- 鄭伯壘 (2011)。百花齊放或定於一尊？本土心理學研究路線的抉擇。 *本土心理學研究*，36，127-138。
- Alicke, M.D., & Govorun, O. (2005). The Better-Than-Average Effect. In M. D. Alicke, D. A. Dunning, & J. I. Krueger (Eds.), *Studies in self and identity. The Self in Social Judgment* (pp. 85-106).
- Anderson, P. W. (1972). More is different. *Nature*, 177(4047), 393-396.
- Archer, M. S., & Elder-Vass, D. (2012). Cultural system or norm circles? An exchange. *Europae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15, 93-115.
- Ash, M. G. (1998). *Gestalt psychology in German culture, 1890-1967: holism and the quest for objectiv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tkins, P. W. (1994). *The second law*. Scientific American Library.
- Berry, J. W., & Kim, U. (1993). The way ahead: From indigenous psychologies to a universal psychology. In U. Kim & J. W. Berry (Eds.), *Indigenous psychologies: Research and experience in cultural context*. Sage.
- Bhaskar, R. A. (1975). *A Realist Theory of Science*. Humanities Press.
- Breitmeyer, B. G. (2010). *Blindspo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ruce, V., & Young, A. (1986). Understanding face recognition.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77, 305-327.

- Bruce, V., & Young, A. (2012). *Face Perception*. Psychology Press.
- Carey, N. (2012). *The epigenetics revolution how modern biology is rewrit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genetics, disease, and inheritanc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Chomsky, N. (1957). *Syntactic structures*. The Hague: Mouton.
- Clifford, C. W. G., & Rhodes, G. (Eds.). (2005). *Fitting the mind to the world: adaptation and after-effects in high-level vis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llishaw, S. M., & Hole, G. J. (2002). Is there a linear or a non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rotation and configural processing of faces? *Perception*, 31, 287-296.
- de Haan, E. H., Young, A. W., & Newcombe, F. (1987). Face recognition without awareness. *Cognitive Neuropsychology*, 4, 385-415.
- de Haan, E. H., Young, A. W., & Newcombe, F. (1991). A dissociation between the sense of familiarity and access to semantic information concerning familiar people. *European Journal of Cognitive Psychology*, 3, 51-67.
- de Haan, M., Johnson, M. H., Maurer, D., & Perrett, D. I. (2001). Recognition of individual faces and average face prototypes by 1- and 3-month-old infants. *Cognitive Development*, 16, 659-678.
- de Laplace, P. (1994). *Philosophical Essay on Probabilities* (A. I. Dale, Trans.). Springer-Verlag.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25).
- de Renzi, E., Faglioni, P., Grossi, D., & Nichelli, P. (1991). Apperceptive and Associative Forms of Prosopagnosia. *Cortex*, 34(3), 403-415.
- de Saussure, F. (1959).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 (W. Baskin, Trans.). Philosophical Library.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13)
- Delbrück, M. (1949). A physicist looks at biology. *Trans Conn Acad Arts Sci*, 33, 173-190.
- Derrida, J. (1997). *Of grammatology* (G. C. Spivak, Tran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67)
- Dudai, Y. (1989). *The neurobiology of memory: Concepts, findings, trend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udai, Y. (2002). *Memory from A to Z: Keywords, concepts and beyo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Edelman, G. M. (1987). *Neural Darwinism: the theory of neuronal group selection*. Basic Books.
- Enriquez, V. G. (1979). Towards cross-cultural knowledge through cross-indigenous methods and perspectives. In J. L. M. Binnie-Dawson, G. H. Blowers & R. Hoosain (Eds.), *Perspectives in Asian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Swets & Zeitlinger, BV.

- Farah, M. (2004). *Visual agnosia* (2nd ed.). MIT Press.
- Ferraris, M. (2015). *Introduction to new realism* (S. de Sanctis, Trans.). Bloomsbury Academic.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2015)
- Feynman, R. P., Leighton, R. B., & Sands, M. L. (2006). *The Feynman lectures on physics* (Vol. 3). Pearson/Addison-Wesley.
- Findlay, J. M. & Gilchrist, I. D. (2003). *Active vision: the psychology of looking and see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iske, A. P. (1991). *Structures of social life: The four elementary forms of human relations*. The Free Press.
- Flude, B. M., Ellis, A. W., & Kay, J. (1989). Face processing and name retrieval in an amomic aphasic-names are stored separately from semantic information about familiar people. *Bran and Cognition*, 11(1), 60-72.
- Fodor, J. (1983). *The modularity of mind*. MIT Press.
- Gabriel, M. (2015). *Why the world does not exist* (G. S. Moss, Trans.). Pol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2013)
- Goodwin, B. (2001). *How the leopard changed its spots: the evolution of complexit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Goren, C. C., Sarty, M., & Wu, P. Y. K. (1975). Visual Following and Pattern Discrimination of Face-like Stimuli by Newborn Infants. *Pediatrics*, 56(4), 544-549.
- Gould, S. J., & Lewontin, R. C. (1979). The spandrels of San Marco and the Panglossian paradigm: a critique of the adaptationist programme.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205(1161), 581-598.
- Greene, B. (2003). *The elegant universe: superstrings, hidden dimensions, and the quest for the ultimate theory*. Norton.
- Gregory, R. (1970). *Intelligent eye*.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 Gregory, R. (1980). Perception as hypotheses.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B290, 181-197.
- Gregory, R. (2009). *Seeing through illus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uyer, P. (2006a). Introduction: The starry heavens and the moral law. In P. Guyer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Kant and modern philosoph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uyer, P. (2006b). *Kant*. Routledge.
- Hargittai, I., & Hargittai, M. (1994). *Symmetry: A Unifying Concept*. Random House Inc.
- Harris, G. G. (1989). Concepts of individual, self, and person in description and analysi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91, 599-612.

- Hempel, C. G. (1958). Fundamentals of concept formation in empirical scienc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Unified Science*, 2(7).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empel, C. G. (1965). *Aspects of scientific explanation*. Macmillan.
- Hempel, C. G. (1977). Formulation and formalization of scientific theories. In F. Suppe (Ed.),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theorie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Henry, J. (2008).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 Red Globe Press.
- Herbert, N. (1985). *Quantum reality: beyond the new physics*. Anchor Books.
- Hergenhahn, B. R. (2009).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psychology*. Wadsworth Cengage Learning.
- Hildebrandt, S., & Tromba, A. (1985). *Mathematics and optimal form*. W. H. Freeman & Co.
- Hole, G., & Bourne, V. (2010). *Face processing: psychological, neuropsychological, and applied perspectiv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olton, G. (1988). *Thematic origins of scientific thought: Kepler to Einstei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ood, B. (2012). *The Self Illusion: Why There is No 'You' Inside Your Head*. Constable.
- Hwang, K. K. (2005). A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on the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of indigenous psychologies.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8(1), 5-17.
- Hwang, K. K. (2011). The mandala model of self. *Psychological Studies*, 56(4), 329-334.
- Hwang, K. K. (2015a). Cultural system vs. pan-cultural dimensions: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on approaches for indigenous psychology.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 45(1), 1-24.
- Hwang, K. K. (2015b). Culture-Inclusive Theories of Self and Social Interaction: The Approach of Multiple Philosophical Paradigms.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r*, 45(1), 39-62.
- Hwang, K. K. (2018). A psychodynamic model of Self-nature. *Counselling Psychology Quarterly*, 32(3-4), 285-306. <https://doi.org/10.1080/09515070.2018.1553147>
- Hwang, K. K. (2019). *Culture-inclusive theories: An epistemological strate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ames, W. (2005). *Pragmatism*. Scholar's Choic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07)
- Jin, E. W., & Shevell, S. K. (1996). Color memory and color constancy. *Journal of the Optical Society of America*, 13(10), 1981-1991.
- Johnson, M. H., Dziurawiec, S., Ellis, H., & Morton, J. (1991). Newborns' preferential tracking of face-like stimuli and its subsequent decline. *Cognition*, 40(1-2), 1-19.
- Kaku, M. (2004). *Einstein's cosmos*. W. W. Norton & Company.

- Kanizsa, G. (1979). *Organization in vision: essays on gestalt perception*. Praeger.
- Kant, I. (1996).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W. S. Pluhar, Trans.). Hackett Pub. Co.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781)
- Kant, I. (2007). *Critique of Judgment* (J. C. Meredith, Tra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790)
- Kant, I. (2015).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M. Gregor, Tra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788)
- Kelly, D. J., Quinn, P. C., Slater, A. M., Lee, K., Gibson, A., Smith, M., Ge, L., & Pascalis, O. (2005). Three-month-olds, but not newborns, prefer own-race faces. *Developmental Science*, 8, F31-F36.
- Kersten, D., Mamassian, P., & Yuille, A. (2004). Object perception as Bayesian inference.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5, 271-304.
- Kim, U., & Berry, J. W. (Eds.). (1993). *Indigenous psychologies: Research and experience in cultural context*. Sage.
- Kitcher, P. (2006). "A Priori". In P. Guyer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Kant and modern philosoph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leffner, D. A., & Ramachandran, V. S. (1992). On the perception of shape from shading. *Perception & Psychophysics*, 52, 18-36.
- Köhler, W. (1930). *Gestalt psych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new concepts in modern psychology*. G. Bell.
- Köhler, W. (1969). *The task of Gestalt psycholog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orn, C.W., Prehn, K., Park, S.Q., Walter, H., & Heekeren, H.R. (2012). Positively Biased Processing of Self-Relevant Social Feedback.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32(47), 16832-16844.
- Lakoff, G. (1987).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udan, L. (1981). Science and hypothesis: Historical Essays on Scientific Methodology. *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 Series in philosophy of Science*, 19. D. Reidel.
- Lazareva, O. F., Shimizu, T., & Wasserman, E. A. (Eds.). (2012). *How animals see the world: comparative behavior, biology, and evolution of vis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each E. (1970). *Lévi-Strauss*. Fontana/Collins.
- Lederman, L. M. & Hill, C. T. (2004). *Symmetry and the beautiful universe*. Prometheus Books.
- Lévi-Strauss C. (1976). *Structural anthropology* (M. Layton, Trans.). Basic Books.
- Livingstone, M., & Hubel, D. (1988). Segregation of form, color, movement, and depth: anatomy, physiology, and perception. *Science*, 240(4853), 740-749.

- Longuenesse, B. (2006). Kant on *a priori* concepts: The metaphysical deduction of the categories. In P. Guyer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Kant and modern philosoph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undy, M. (2002). *Sacred geometry*. Bloomsbury USA.
- Lundy, M. (2005). *Sacred number: The secret quality of quantities*. Bloomsbury USA.
- Maurer, D., & Young, R. E. (1983). Newborn's following of natural and distorted arrangements of facial features. *Infant Behavior & Development*, 6(1), 127-131.
- Maurer, D., Le Grand, R., & Mondloch, C. (2002). The many faces of configural processing.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6, 255-260.
- McKone, E. (2004). Isolating the special component of face recognition: peripheral identification and a Mooney fac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and Cognition*, 30, 181-197.
- Metzger, W. (2006). *Laws of seeing* (L. Spillmann, Trans.). MIT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36)
- Nagel, T. (1974). What Is It Like to Be a Bat?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83(4), 435-450.
- Palmer, S. E. (1999). *Vision science: Photons to phenomenology*. The MIT Press.
- Pascalis, O., & Kelly, D. J. (2009). The Origins of Face Processing in Humans: Phylogeny and Ontogeny.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4, 200-209.
- Piaget, J. (1970). *Structuralism* (C. Maschler, Trans.). Harper & Row.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68)
- Piaget, J. (1981). *The Principle of genetic epistemology* (W. Mays, Trans.). Knowledge & Kegan Paul.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72)
- Pinker, S. (2000). *The language instinct: how the mind creates language*. W. Morrow and Co.
- Pollard, K. S. (2009). What makes us human? *Scientific American*, 300(5), 44-49.
- Popper, K. (1934/1959).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Hutchinson.
- Quinn, P. C., Yahr, J., Kuhn, A., Slater, A. M., & Pascalis, O. (2002). Representation of the gender of human faces by infants: A preference for female. *Perception*, 31, 1109-1121.
- Ramachandran, V. S. (1995). 2-D or not 2-D — that is the question. In R. Gregory, J. Harris, P. Heard & D. Rose (Eds.), *The artful ey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orty, R. (Ed.). (1967). *The Linguistic Turn: Recent Essays in Philosophical Method*.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Russell, B. (1965). *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George Allen & Unwin
- Schmid, C. J., & Wolfe, J. L. (2012). *Neuronal Cell Apoptosis*.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 Schweinberger, S. R., & Burton, A. M. (2003). Covert recognition and the neural system for

- face processing. *Cortex*, 39(1), 9-30.
- Sedikides, C., & Gregg, A.P. (2008). Self-Enhancement: Food for Thought,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3(2), 102-116.
- Shabel, L. (2006). Kant's philosophy of mathematics. In P. Guyer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Kant and modern philosoph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hweder, R. A., Goodnow, J., Hatano, G., LeVine, R. A., Markus, H., & Miller, P. (1998). The cultural psychology of development: One mind, many mentalities. In W. Damon & R. M. Lerner (Eds.),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vol. 1: Theoretical models of human development* (5th ed.). Wiley.
- Singer, W. (1996). Neuronal synchronization: A solution to the binding problem? In R. R. Llinás & P. S. Churchland (Eds.), *The mind-brain continuum: Sensory processes*.
- Skyrms, B. (2000). *Choice and chance: an introduction to inductive logic* (4th ed.). Wadsworth/Thomson Learning.
- Stewart, I. (1997). *Nature's numbers: The unreal reality of mathematics*. Basic Books.
- Stewart, I. (1998). *Life's other secret: the new mathematics of the living world*. John Wiley
- Sundararajan, L. (2015). Indigenous Psychology: Grounding Science in Culture, Why and How?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 45(1), 63-80.
- Sundararajan, L., Hwang, K. K., & Yeh, K. H. (2020). *Global Psychology from Indigenous Perspectives*. Palgrave Macmillan.
- Tanaka, J. W., & Farah, M. J. (1993). Parts and whole in face recogni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Human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46A(2), 225-245.
- Tanaka, J. W., & Sengco, J. A. (1997). Features and their configuration in face recognition. *Memory and Cognition*, 25(5), 583-592.
- Thompson, P. (1980). Margaret Thatcher: a new illusion. *Perception*, 9, 483-484.
- Thomson, G. (2003). *On Kant*. Thomson/Wadsworth.
- Treisman, A. M. (1996). The binding problem. *Current Opinion in Neurobiology*, 6(2), 171-178.
- Walker, R. C. S. (2006). Kant and transcendental arguments. In P. Guyer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Kant and modern philosoph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egner, D. M. (2002). *The illusion of conscious will*. The MIT Press.
- Yang, K. S. (2000). Monocultural and cross-cultural indigenous approaches: The royal road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balanced global psychology.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3), 241-263.
- Yin, R. K. (1969). Looking at upside-down fac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81(1), 141-145.

Young, A., Hellawell, D., & Hay, D. C. (1987). Configurational information in face perception. *Perception*, 16, 737-759.

How to Construct a Culture-inclusive Theory of Universality

Jen-Hao Li*

Abstract

The most challenging task of indigenous social sciences is constructing a culture-inclusive theory and working towards a universal one. This is the famous social science principle of “one mind, many mentalities; universalism without uniformity,” described by cultural psychologist Richard Shweder. Most social scientists adopt data-driven inductive methods, such as the derived etic approach, cross-indigenous method, or cross-cultural approach, to achieve this goal, while few adopt theory-driven deductive practices. One example is Hwang, who formulated the two-step epistemological strategy, including: (1) constructing a universal model with a transcendental formal structure; (2) using the formal model to study the particular mentalities of people in a given culture. Hwang expounded on the strategy with examples of the Face and Favor Model and Self and Self-nature Psychodynamic Model. However, he has not adequately explained them despite asserting they are universal models with formal transcendental structures. This article clarifies “formal transcendental structure” using multiple philosophical paradigms. Two principal approaches, philosophical and scientific, are adopted. Firstly, we explain “transcendental” with Kant’s transcendental epistemology, from which three meanings were revealed: not reliant on and not derived from experience, necessary and universal, and purely formal. Then we explain “formal structure” with Piaget’s structuralism, which possesses five characteristics: wholeness, transformation, self-regulation, dynamic equilibrium, and symmetry. Finally, we expound on “formal transcendental structure” from evolutionary, cognitive, perceptual, and neuro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Most importantly, research on visual agnosia, especially prosopagnosia, has shown that humans use two main processes to see and understand the world: (1) apperceptive recognition, which relies on transcendental formal structure; (2) associative recognition, which associates sense data that necessarily conform to transcendental formal structure with knowledge and memory. We proposed an innovative methodological paradigm called DUA (Dual Universality Approach), a modified two-step epistemological strategy based on this research. According to DUA, there are two routes to universality: transcendental universality and empirical universality. The former, using a deductive method or transcendental arguments, can have three kinds of transcendental formal structure to achieve the aim: (1) number; (2) form; (3) transcendental category. The latter, using the inductive method, particularly statistics and probability theory, can have three ways to attain

the goal: (1) cross-culture research; (2) developmental research; (3) longitudinal research. Comparative and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research demonstrate empirical universality and connect to transcendental universality. Finally, DUA insists on the precedence of transcendental universality, i.e., firstly constructing a universal theory with transcendental formal structure and then putting any cultural content or phenomena into the formal theory to be a culture-inclusive theory and further comparing it to any other cultures in the hope of attaining empirical universality. They correspond to the main results of visual agnosia research, showing two main processes of how perceptual and cognitive systems recognize objects or acquire knowledge: (1) apperceptive recognition and (2) associative recognition. In sum, DUA has a solid epistemological and scientific ground and thus can be a methodological paradigm for any social science researcher to construct a cultural-inclusive theory of universality.

Keywords: Culture-inclusive Theory, Kant's Epistemology, Prosopagnosia, Transcendental Deduction of the Categories, Transcendental Formal Structure, Universal

Jen-Hao Li*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enigma4tears@gmail.com)